

千里追歼 席卷湘南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后进行的衡宝战役

■薛闰兴 韩丹丹

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四野战军5个兵团在地方中共组织与游击武装的支持和配合下,发动衡宝围歼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主力。衡宝战役一举解放湖南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为湖南全省解放扫清了障碍,也为解放华南、西南营造了有利的军事和政治态势。这场战役,恰好是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前后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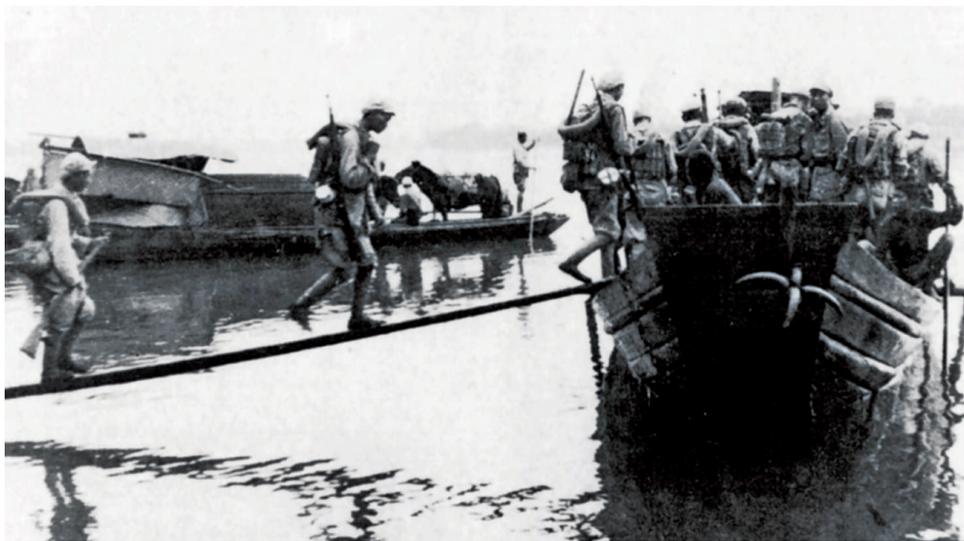
细致研判,将计就计。1949年8月5日,湖南省和平解放,湖南临时省政府成立,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仍盘踞湘南,还在芷江另立“湖南省政府”,企图在衡阳、宝庆(今邵阳)及湘桂边界负隅顽抗。

为摸清白崇禧集团的真实战略意图,第四野战军认真分析了敌往来的几百份电报。根据白崇禧司令部电令“各军发放五分之一广西地图”,电告广西省政府上报“各地存粮数”以及“桥梁分布和承重情况”3份电报,我军研判认为白崇禧集团可能想退守广西老巢,但决不会甘心放弃湘南。据此,第四野战军制定了先稳住敌军,暂缓攻击,再以两支部队从东南两翼作战略迂回,截断其退路、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为彻底稳住敌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计就计,利用投诚的敌潜伏电台台长向白崇禧司令部发报称:“共军四野士兵多系东北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又极为疲惫,伤病员甚多,正处于休整状态,部队已放秋衣,未发现有重大行动之迹象”。得到此消息,白崇禧随即决定继续修筑工事,先图固守,寻机再战,并重新布置防御,构筑起一条东起粤北与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与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湘粤联合防线”,打起了以此防线迟滞或南进,拖延时间、保存实力、争取美援的如意算盘。

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趁机率采取以先遣部队与敌接触,掩护主力部队休整的方式,开展了为期40天的“兵强马壮运动”,使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装备上、战术上、生活上实现了由北方初入南方的适应性转变,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和士气。同时,采取干部进乡入户,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方式,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支前活动。这一举措不仅使湖南省各地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也使军队的粮食供应得到初步解决。

因敌施策,审慎决策。中央军委报



衡宝战役中我官兵追击敌人(湖南党史陈列馆供图)

据白崇禧“非万不得已决不会与我决战”的意图和作战部署,命令第四野战军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式,迫使敌军与我作战。针对白崇禧防御退却、保存实力的战略意图和以攻为守、故布疑阵、虚张声势的行动特点,我军提出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站稳脚跟,迫使决战、一举歼灭的战略方针。

由于桂军熟悉地形,善于突袭、埋伏,包围我前哨部队并快速退却撤离,第四野战军要求部队学会奔袭作战、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注意侦察警戒,决不轻兵冒进。以第13兵团为西路军,断敌西退云、贵之路;以第4、15兵团为东路军,夺取广州,而后第4兵团继续西进,实施大迂回,断敌逃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与西路军形成钳形包围;第12兵团为中路军,正面牵制敌人,待合围完成后,尾随敌人进入广西,与预期到达的第4、13兵团一起,将白崇禧集团歼于广西境内。

试探攻击,金钩钓鳖。9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继续向中南大陆进军”的号令,第二、四野战军兵分东、中、西三路向“湘粤联合防线”进攻,通过试探性攻击,寻找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部队。根据“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中路军第49军奉命提速前进,与友邻部队拉开了

近2天的行程,诱使白崇禧以其王牌第7军和第48军在青树坪布下“口袋阵”。第49军在水土不服、不熟悉地形、与后续部队脱节,且遭敌优势兵力围攻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较小代价致使白崇禧主力位置暴露。

青树坪伏击战让白崇禧认为战局已经逆转,打消了撤回广西的念头,决心死守湘桂门户。9月29日,我军下达进攻命令。10月2日,东、西路军突破“湘粤联合防线”两翼,切断桂军西甯贵州、南逃的退路。中路军也集结完毕,完成攻击准备。10月3日,白崇禧急调主力增援衡宝防线,摆出一副决战姿态。我军起初判断白崇禧有反击意图,为避免一线部队因分散和过于突出而遭敌袭击,决定“诱敌北进,予以聚歼”,并于10月4日23时急令各部队暂停南进,调整部署,与敌决战。

孤军虎胆,“腰斩七军”。我第45军先头135师因电台失灵,未接到第四野战军“就地停止待命”的电令,一路猛冲猛打,越过衡宝公路,孤军穿插至桂军纵深官殿地区,打乱了桂军的作战部署,迫使白崇禧命令集中其王牌“钢七军”2个师和48军2个师正面包抄,1个师后尾阻击135师。在后被迫遭重兵伏击、坚守无所依托的情况下,135师师长丁

盛毅然选择与敌正面硬碰硬。第四野战军及时察觉战场态势变化,果断发出三路并进、全线出击的命令。这样,135师便成了堵击、侧击、迟滞南逃之敌的阻击部队。

经过5天5夜激战,我军打破了“小诸葛”白崇禧的“口袋阵”,堵住了敌人南逃的通道。10月9日,135师与南逃的桂系主力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发生激战,敌军部及直属队4个营被全歼。第7军下属的4个精锐师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在东、西路军的迂回包围截击和中路军的疾速追击中也全被全歼。战后,刘伯承称135师此举是“腰斩七军”。

衡宝战役历时34天,我军以伤亡4400余人的代价,围歼国民党3个军部、5个整编师,重创6个师,歼灭国民党军共4.75万余人,俘敌军官18名,缴获各种火炮402门、汽车176辆、弹药100余万发,解放县市28座。此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地区的首次重大战役,为之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第三野战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的军事和政治条件。

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



中国邮政于2019年10月7日发行《古代思想家(二)》纪念邮票,其中一张为王阳明

王阳明(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他曾经隐居会稽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故后人称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在儒学上卓有建树,建立的“心学”对当时及晚明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王阳明不仅对古典兵学有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将之运用到战争实践中。

去患求善,慎重为战

王阳明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这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继承。这种慎重态度,与孙子也较为接近。王阳明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最终手段,也即孙子所说的“非危不战”。他在《平茶寮碑》中写道:“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在一篇祭文中,他出于对阵亡将士的感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指出:“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

相比战争,王阳明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纷争。例如当发生叛乱,他更主张使用安抚手段,而不是动辄发起征讨。在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的一份奏疏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王阳明将征讨战争的“十患”总结为“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追捕厮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为盗”等;将政治安抚的“十善”总结为“培国家元气”“百姓无椎磨刻髓之苦”等。很显然,“十善”与“十患”的对比,表现出王阳明对待战争的鲜明态度。

王阳明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正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数次战争,亲眼目睹过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他看来,是否发起战争,需要充分论证,进行多方利害权衡。如果可以通过招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切不可将百姓无端推入战争之中。

整饬边务,赏罚分明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朝已日薄西山,逐渐步入衰落。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王阳明积极思考对策,上书朝廷《陈言边务疏》,为整饬边务建言献策,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军队建设和管理。王阳明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一语,强调加强战备、增加防守实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加强部队训练工作,提升军队战斗力。

他首先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即“蓄材以备急”和“舍短以用长”。这就是说,不仅要重用人才,而且要做到用人之所短。他建议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把那些“文武兼济之才”选拔出来,既“习之以书史骑射”,也“授之以韬略谋猷”。其次则是做好军备物资的储备和保障,即“简师以省费”和“屯田以给食”。一方面实行精兵政策,减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解决边境官兵的吃饭问题。为此,王

王阳明的兵学思想与实践

■黄朴民 熊剑平

阳明建议非战斗部队积极参加屯田,即“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加强军队管理,他的主张是“行法以振威”和“敷恩以激怒”。他列举李光弼、狄青等名将治军的例证,说明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他也注意提高对士卒的奖励,此即“敷恩以激怒”。只有落实好赏罚制度,才可以让全体将士令行禁止,奋勇向前。王阳明建议朝廷关心士卒和其父母子弟的疾苦,并对死难将士加强抚恤,让“死者皆无怨尤”,从而“生者自宜感动”。

巧用谋略,诡道胜敌

王阳明的兵学思想并非“纸上谈兵”,他亲身参与过多次平叛战争,战绩斐然。他由此给后人留下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印象。

正如王阳明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他不仅精研古代兵典,也在战场上灵活运用。在战争实践中,他将兵家的用兵谋略与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相结合,推动了兵学与儒学的融合。王阳明指挥的平叛战争,计谋皆堪称精妙,而且非常高效。他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果断发起攻击,力争“一战而破强胡”。

熟读儒家经典的王阳明并不迂腐,而是非常善于变通。在情势紧急时,王阳明不拘一格,大胆运用伪造檄文的手段来威慑敌方,充分体现他出众的胆识和灵活务实的能力。精研《孙子兵法》的王阳明,用兵多用诡诈之术。得知敌我双方在兵力上存在差距,他便使用欺骗手法来调动敌方,等待援兵的到来,积极创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得知叛军围攻安庆,王阳明立即指挥军队全力进攻南昌,巧妙运用孙子“以迂为直”的策略和孙臆“围魏救赵”的计谋。王阳明对情报的重视、对间谍的使用等,也都与孙子的用兵方略颇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硕儒王阳明熟悉并善于运用兵法,体现出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征。

奇袭武陵桥

■宁政杰 高 凯

能否将敌困于德川并全歼,阻敌南逃北援,也可以说关系到整个二次战役西线的全局。为此,38军军长梁兴初亲自决策,并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侦察支队虽然只有323人,但军长梁兴初不仅挑选了军部、113师的精干侦察力量,还协调了13名朝鲜向导、1名英语翻译和众多医务人员加入,并将军里1名译电员也分配给侦察支队。与此同时,他还为侦察支队调配600公斤炸弹,充足的子弹、手榴弹,并准备了南朝鲜军和美军的军服及部分装备;在支队通过敌前沿时,还令给予炮火掩护。这些举措为侦察支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实施穿插作出了有力保障。

尖兵行动迅速。在穿插途中,侦察支队以尖兵班为“触角”及时了解敌情动态。接近敌前沿时,我军发现敌正在构筑工事,乘敌不备捕捉敌两名哨兵,经教育后令其担任向导,有惊无险地从浦洞敌据点通过。到达大同江渡口新坪里后,前卫尖兵与敌遭遇,先放开花,毙伤敌数十名,俘敌6名,并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将南朝鲜军俘虏策反。据俘虏供称,该处为敌一个大队,共约300人,莫滩里水电站则有“联合国军”一个联队驻守。根据该情况,25日1时20分,尖兵班快速越过大同江,控制江岸附近的制高点,掩护全支队沿着水深1米的陡涉场顺利渡过大同江。

情况处置得当。此次行动中,侦察支队323人经过一天两夜的穿插渗透180余公里,人员多、装备多、路程长,且道路复杂,既有大路行车,又有荒山密林。即使是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到达目的地也很困难,况且途中还需处置通过敌封锁线、哨卡、与敌遭遇等多种情

况。我军指挥员、战斗员、朝鲜语翻译、英语翻译相互配合,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机智灵活的处置。同时,我军巧妙利用敌军官兵上下级之间的矛盾,顺利通过哨兵关卡,提前3个小时到达武陵里,高效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作战部署合理。侦察支队到达武陵里的时间大约为11月26日凌晨3时,敌人尚在熟睡之中。支队队长张魁印确定了“两边阻击、突然袭击、快速爆破”的战术,即军侦察连负责消灭大桥守敌,并掩护工兵排炸桥;113师侦察连占领大桥两侧有利地形,阻击南撤北援之敌,掩护炸桥行动;配合侦察支队行动的朝鲜游击队在大桥南侧占领有利位置,负责袭扰北援之敌,迟滞敌人行动。

作战打响后,军侦察连首先对守桥之敌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四处溃逃,除伤亡、被俘外,少数逃往山里。其他各组相互配合阻敌增援,爆破组从冰面上搭人梯将160公斤炸药安放好,于26日7时50分成功炸毁武陵桥。

政治工作有力。侦察支队出发前,军首长亲自进行战斗动员,讲清完成任务的意义,分析利弊条件,增强了官兵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完成任务的信心。行军途中,侦察分队严守群众纪律,注重军民团结。到达浦洞后,通过当地群众了解敌人情况;在仙游峰,一位朝鲜老人带病为支队当向导,保证支队提前到达武陵里。

整场战斗中,侦察支队只有一人牺牲。这场传奇般的战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军事教育片《奇袭武陵桥》,因反响极佳,后又翻拍为电影《奇袭》,在我国军事电影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



1950年11月底,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为达成24小时内攻占德川、全歼南朝鲜军第7师的战役目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派出一支侦察支队,秘密插入敌后,打算炸毁武陵桥,阻断敌人退路。侦察支队由38军军部侦察连、113师侦察连、两个工兵排和部分医务、翻译、向导等人员组成,由军侦察科长张魁印与113师侦察科长周文礼率领。11月24日晚10时至26日7时50分,侦察支队强行军180余公里,秘密穿插至敌后,成功破袭敌重要交通要点武陵桥,为保障38军主力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起到重要作用。

优选穿插路线。穿插路线选择正确与否是奇袭成功的关键。支队组建

后,立即开赴前沿的松山里北侧集结,并展开敌情研究、勘察地形。很快,支队发现松山里至浦洞一线可能是南朝鲜军第7师和第8师的接合部,为敌部初始的间隙,便决定以此作为渗透点,从两个师接合部的间隙插入其纵深,制定了“松山里-浦洞-新坪里-大同江-莫滩里-南中里-仙游峰-武陵里-武陵桥”的穿插路线。

选择此路线,主要是利用敌人麻痹疏忽、戒备不严的弱点。在与敌遭遇前,出敌不意大胆地沿大路前进,既能够争取时间,也利于争取主动;在与敌遭遇后,主动离开大路、避敌追击,在荒山密林中快速穿插,让敌难觅我踪迹,确保能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集中全力保障。奇袭武陵桥关系到



浙江省余姚市王阳明故居